



西周昭王时期南土经营的差异化路径与 治理模式转变*

——以金文材料为中心

刘 伟 牟浩馨

摘 要: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是汉淮间两大地理单元,也是昭王南土经略的重点区域。针对两地不同的政治地理价值,昭王采取了差异化的经营措施,对南阳盆地以政治统制为主,而对随枣走廊则以军事控制为主。面对昭王南征失败后南土动荡的局势,西周王朝开始采取徙封与联姻相结合的“地缘-血缘”模式来实现对南土地区的有效统治。从西周中后期南土治理模式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宜”之法始终是周人变更区域发展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昭王;南土经营;治理模式;“土宜”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085-09

南巡是昭王时期在南方地区展开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直接影响到西周中晚期南土政治格局的发展走向和西周王朝的百年兴衰。学界已对相关青铜器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并编排出相关历日^①。梳理相关材料可知,昭王曾经对南土展开过一系列的经营与开发活动,其经略范围主要集中在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一带。针对两大区域不同的政治地理属性,昭王采取了符合各自发展模式的差异化经营路径,即所谓“土宜”^{[1]600}之法,以实现南土不同地区的有效统治。前贤时人对昭王南征作过不少讨论^②,但往往集中在铭文考释和南征史实等问题上,故仍有未尽之意。本文拟就昭王后期经营南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路径进行细致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西周中后期南土治理模式的转变与政治地理格局的重塑,以就正于方家。

一、昭王时期对南阳盆地的政治统制

南阳盆地位于王畿以南、汉水之北,“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2],是长江中游四大地理单元之一,也是昭王南巡路上的重要战略基地。南阳盆地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属于周人直接控制的南部国土。因此昭王对南阳盆地的治理和经营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如派遣官员省察大小邦国、贯通往来道路等。

(一)昭王南巡前的“省察”与“贯行”

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铭文记载了昭王派遣中前往南国“省察”“贯行”等相关史事,今参酌诸家释读移录于下:

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孰压在曾,史儿

收稿日期:2023-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出简帛《国语》类文献整理与研究”(21BZS002)。

作者简介:刘伟,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曲阜 273165),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与早期经典文献研究。牟浩馨,女,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山东曲阜 273165)。

至,以王命曰:“余命汝使小大邦,厥又舍汝
 芻量至于女,廩小多□。”中省自方、登
 (邓),迹(洧)、𡗗邦,在噩师跡(次)。伯买父
 乃以厥人戍汉州,曰段、曰旒旒,卒厥人
 □廿夫,厥贾𡗗言曰:“宾□贝,日传□王□
 休,肩有羞。”余□□,用作父乙宝彝。(《集
 成》949)^③

“省南国贯行”就是贯通前往南国的道路,这是昭王南巡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自京师前往南国道阻且长,南方的自然环境非常复杂,山脉、湿地犬牙交错,河流、沼泽萦绕纵横,地势高低不一,气候复杂多变。对于周人而言,南方不仅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未知、危险和敌意的世界^{[3]339}。《左传》曾经追述过楚国先君“筓路蓝缕”“以启山林”^{[1]798}“以处草莽”^{[1]1485}的事迹,不难看出,熟悉南方环境的楚人尚且需要跋山涉水开辟道路,更何况鲜少涉足南方的周人。西周时期,南阳盆地是连接中原王朝与南方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因此针对南阳盆地的交通特点和政治属性,昭王在南巡前曾经多次下达“省南国”的命令,派遣官员巡行视察南阳盆地,并在沿线设置军事战略据点、派遣军队驻扎。中甗铭文记载,中曾经奉昭王之命前往南阳盆地巡行视察大小邦国并贯通往来的道路,为王师南下做准备。

“方”地是中奉命巡察的第一站,此“方”应即方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南^[4]。昭王南巡的始发地是成周,“方”地正是王师自成周南下的隘口。自商周以来,方城便是南北交通大道的经行之地,殷人征讨“居国南乡”的荆楚、周人自雒邑通往南服都是逾方城之隘^[5]。恭王时期的士山盘记载周王曾经命令士山前往治服“蠹(都)、刑(荆)、方”,都、荆均处于南土,因而此“方”应与中甗里的“方”同为一地^[6]。士山巡察南土后应即由“方”地回京复命。春秋时期南阳盆地成为楚国的北疆之后,中原诸国入楚基本上都是经由方城,如清华简《系年》载“公会诸侯于湟梁,遂以迁许于叶而不果。师造于方城”^{[7]177}便是一例。所以中在接到“史(使)小大邦”的命令后首先选择前往“方”地巡察,目的是确保王师可以顺利从成周进入南阳盆地。

“邓”地即南阳盆地最南端的古邓国^[8],在

今湖北襄阳附近。清人顾祖禹曾云:“(邓州)西控商、洛,南当荆、楚……南北有事,襄邓为之腰膂。”^{[9]2415}邓国是连接南阳盆地和江汉地区的交通孔道,也是沟通南北交通、连接江淮和巴蜀的重要枢纽^{[10]18}。辛德勇根据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复原出了秦南郡交通路线图,自邓县(古邓国)南下经行诸县、乡、津可抵达江陵、夏洳一带^[11],据此路线亦可大致复原出周昭王南巡的进军路线和方向。由此可见,邓国是昭王穿过南阳盆地前往江汉地区的必经之地,所以中在巡视完方地之后前往邓地省察,以贯通王师南下的通道。

“洧”字从水从舟,其地史籍无载。同为昭王时器的启尊中也有“洧”地,其铭曰:“启从王南征,徬山谷,在洧水上,启乍(作)且(祖)丁旅宝彝。”(《集成》5983)黄锡全推测两处“洧”应属一地,“洧”当读为“汎”,“洧(汎)水”也写作“汜水”,史籍所载“汜水”有四条,此处为南汜水,入汉水处应在今之襄樊市以西^[12]。南汜水位于成周与楚交通的要冲汝颍之间,是历代南北军事冲突的必争之地^[13]。“洧”与“邦”之间缺释的“𡗗”字应从黄锡全之说,释其为“蓼”^[12],即位于河南唐河县南的古蓼国。蓼国处于南阳盆地东南经桐柏山入枣阳县境的交通线上^{[10]55},沿蓼国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行便可穿过随枣走廊直抵荆楚、扬越等地。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南巡前昭王曾经派遣中前往南阳盆地省察大小邦国,加强与南土诸国的政治联系,并初步贯通了自成周穿过南阳盆地的交通道路。中甗铭文所涉及的方、邓、洧、蓼分别是南阳盆地内的方地、邓国、汎口、蓼国,四地既是昭王南巡路线上的重要交通点,也是春秋以后方城廊道、西南大道等古道的途经之地。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中记载了秦国南阳郡境内的水陆交通通道,其路线所经之地大致可与西周时期中所省察的大小邦国一一对应^④,可见昭王时期派遣官员省察、贯通的道路在战国晚期直至秦朝仍然是南阳盆地内的主要通道。

(二)昭王南巡中的“设居”“省族”与“振旅”

除了派遣官员巡察大小邦国、贯穿交通路线外,昭王南巡途中还在南阳盆地展开过驻蹕活动,中方鼎铭文记载了中在“夔隳真山”为王

设居一事：

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执王旻，在夔陟真山，中呼归生凤于王，执于宝彝。（《集成》2751）

“执旻”是西周金文中极具时代特色的词语，还见于昭王时期的中胤、静方鼎等器物。《说文·辵部》：“执，种也。”^[14]¹³⁶“执”可引申为建设之义。“旻”从广，从屮省，其字仅见于西周金文，是西周时期周王离宫之专字^[15]⁹³。结合新公布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可知，“夔”是以往习见“射”的繁体，“射”即位于南阳附近的谢国^[16]。《国语·周语上》伯阳父论三川皆震时认为“夫国必依山川”，韦昭注云：“依其精气利泽也。”^[17]¹⁸⁻¹⁹据清人顾祖禹考证，南阳府内重要的古国均有山脉凭依，如唐国境内的唐子山、古蓼国境内的蓼山等^[9]²⁴⁰⁸，王居所在“夔陟真山”应即谢国周围某座适合安营驻扎的山脉。昭王南巡路途遥远，且有许多诸侯同族和军队跟随，所以“夔陟真山”王居的设置一方面可以为昭王提供南巡路上的驻跸之地，便于军队休息、整顿；另一方面又可以王居为中心控扼整个南阳盆地，守卫自成周沿方城南下的通道，同时还有宣喻周礼、归化南土^[15]的政治作用。

安州六器之一的中解还记载了昭王南巡途中在南阳盆地内“省族”“振旅”并赐物的相关史事，铭文曰：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马，自隳侯四鬲，南宫兄（贲），王曰：“用先。”中执王休，用作父乙宝尊彝。（《集成》6514）

中解铭文中的“庚”字，李学勤先生释为“唐”^[18]，此后学者多从之。按《说文·口部》云：“唐，从口，庚声。”^[14]⁶¹“唐”为定纽阳部字，“庚”为见纽阳部字，二字古音相近，“庚”或即唐国。石泉认为唐国地望位于今河南省唐河县南境^[19]，徐少华说其东部当达桐柏、泌阳一带，南与蓼国为邻，西隔唐河与谢国相望，北当与申国接壤^[10]⁶¹。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记载了南郡各地的交通道路和里程，其中多次出现的交通节点“阳”县应即古唐国所在^[20]。若石、徐等之说可信，则唐国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都非常优越，完全可以满足昭王省族、振旅的政治和军事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昭王在“唐”大省公族的同时还曾经举行过“振旅”活动。中解铭文所记

“振旅”之事究竟发生在战前还是战后，学界仍然存在分歧。今按：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稣编钟铭文里同样有周王省族、赐马的记载，铭文云：“王唯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王亲锡驹四匹……又亲济（賚）晋侯……马四匹。”^[21]晋侯折首数百、大败敌军有功，于是周王返回成周后，随晋侯同行的公族开始整顿师旅，周王赏赐晋侯马驹及其他物品。西周晚期的兮甲盘铭文亦载：“王初各伐猗狁于囂廬，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暨，王赐兮甲马四匹、驹。”（《集成》10174）可见在西周时期的战事中，赐马多为赏赐有功的勉励之举，通常发生在诸侯和官员建功立业之后，因此中解应为纪念南巡过程中某场胜利所作。

西周早期，南阳盆地属于西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南土，也是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由上文所述可以看出，昭王经营南阳盆地的重点主要在政治与宏观战略方面，如巡察大小邦国、贯通往来道路等。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西周王朝与南阳盆地诸国之间的政治联系，而且贯通了中原前往南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史墙盘曾经追述昭王：“宏鲁昭王，广筴楚荆，唯寡（贯）南行。”（《集成》10175）裘锡圭认为“寡”可以读为“贯”^[22]，“唯贯南行”便是颂扬昭王贯通南国道路的丰功伟绩。与此同时，昭王经营南阳盆地的“土宜”之法也为后世诸王经略南土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和模式，相似的经营措施还见于西周晚期的士匄父盃，其铭曰：“唯王廿又三年八月，王命士匄父殷南邦君诸侯，乃易（赐）马。王命文曰：‘逵道于小南。’”^[23]朱凤瀚认为“逵”字通“率”，在此当读作“循”，循是顺行之义^[24]，“循道于小南”即率领部队循着道路和南邦封君的次序在小南的区域内巡行。由此可见，西周中后期诸王对南土的经营基本延续了昭王时期的做法。

二、昭王时期对随枣走廊地区的军事控制

随枣走廊一带泛指桐柏山和大洪山之间的广大地区，包括枣阳、随州及南部的孝感等地。从政治地理性质上来说，这一地区位于南土边

域,属于南土与南国的缓冲地带^⑤。终西周之世周人始终不能确立对这一区域的直接控制,有时甚至需要依靠武力镇压才能换取政局的短暂稳定。因此针对随枣走廊一带特殊的地理属性,昭王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加强对这一地带的管控,相关措施有驻师、赐邑等。

(一)临时住所

上引中甗铭文“𠄎应在曾”,是指中在今湖北随州的曾国设置王的行宫、别馆或临时驻扎之地^[25]。2019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曾公𠄎编钟铭文及“昭王南行,豫命于曾”^[26]之事,恰可佐证中甗铭文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昭王南巡过程中虽然也曾命令中在南阳盆地内的“夔隳真山”设置王居,但两处王居的性质显然不同。“夔隳真山”王居的设置是基于宣喻周礼、归化南土^{[15]103}的政治需要,而“曾”地王居的设置则更多是出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应”虽是周王临时居所,但其结构、功能都较为完备^{[15]103}。随州地区的曾国是西周王朝在随枣走廊设置的重要封国,其政治、军事实力长期位于汉阳诸姬之首,楚国不得志于汉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汉东之国,随为大”^{[1]119}。“曾”地王居的设置使得昭王可以深入战略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同时联合周围的曾、鄂、厉等地方诸侯共同征讨南国反叛势力。

根据另一件中方鼎铭文“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𠄎(次)”(*《集成》*2785)的记载,昭王在南巡途中曾经次于“寒”地。次是周王离宫后的临时驻扎之所,*《周礼·天官·掌次》*云:“次者,次则舍也……王出宫,则幕人以帷与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则张之。”^{[27]1456}*《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杨伯峻云:“凡出过三宿俱可谓之次。”^{[1]176}朱凤瀚指出,“𠄎”应当是西周王朝在本土与淮夷聚居地交界处所驻军之所^[24]。而王次于“寒”时曾经赐予中地,所以寒地应距中的采邑孝感不远,极有可能位于南土与南国的边界地带。

“寒”地之次不同于昭王提前派遣官员在固定地点设置的王居,它的实用性和可移动性更加突出,可能是昭王南巡途中设置的“帷幕幄帘”。*《释名·释床帐》*云:“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又云:“幕,幕络也,在表之称也。小幕曰

帘。”“幄,屋也。”^[28]*《周礼·天官·掌次》*疏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陈于上。帷幕皆以布为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帷也。”^{[27]1455}出土材料中有多处关于“帷幕幄帘”的记载,清华简*《子仪》*载秦穆公放归子仪时曾“张大侯于东奇之外”^[29]，“张大侯”即是临时搭建举行放归仪式所需的帷幕帐篷。清华简*《系年》*曾多次记载楚国战败之后丢弃旗帜与帷帐逃亡之事,其文曰:“楚师亡功,多弃旗幕,宵遁。”^{[7]189}“楚人尽弃其旗、幕、车、兵,犬逸而还。”^{[7]196}“幕”是楚人行军作战时使用的帐篷,在战争形势紧急的情况下可以随意处置。无独有偶,随州曾侯乙墓曾经出土过可拆卸的青铜帷帐零件,经过专家复原后构建出完整的帷帐框架,其基本结构是顶部四面坡式,面阔五间,进深两间^[30],印证了相关文献的记载。帷帐的突出特点是建造方便快捷、拆卸简单迅速,在行军路上设“次”比提前派遣官员设置王居更加便捷实用。所以昭王会根据行军情况在“王行所止”之处设置帷帐临时居住,以“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1]541},方便军队暂时休整。

(二)驻师

西周金文中的某师意为在某地屯驻师旅,随州一带的某师便是昭王在南土与南国交界地带屯驻的军队。在南巡前,昭王曾经多次派遣官员前往曾、鄂二国屯驻师旅。在地方诸侯国对中央王室组织的战事提供军事支援的时候,通常由来自西部王畿的官员担任军事行动的主帅^{[31]266}。中甗铭文记载中省察完大小邦国后“在噩师𠄎(次)”(*《集成》*949),此中应即静方鼎里的师中。静方鼎铭文同样记载昭王命令静“鬲(司)在亩(曾)噩(鄂)师”(*《铭图》*02461)^⑥,当静省察结束返回成周述职时,昭王派遣静统率部分西六师军队南下并前往曾、鄂两地驻扎,同时联合周围的地方诸侯共同御敌。

西周早期,随枣走廊一带分布着多个实力强大的地方诸侯国。2009年湖北随州文峰塔出土的曾侯𠄎编钟铭文记载了曾国始封的史实:“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32]早在西周初年成王便册封南公于随州,命令其戍守南土,以监视淮夷、治理江夏。除了姬姓曾国外,周王朝还在随州周围册封了一些异姓诸

侯国,如姁姓鄂国、姜姓厉国等。这些诸侯国同处随枣走廊且大多东西或南北相邻,曾国政治中心位于随州市曾都区庙台子遗址^[33],鄂国中心区域位于曾国西邻的随州安居镇^[34],厉国的地望则在随州东北百余里的旧殷家店一带^[35]。宜侯矢簋中省阅地图的行为说明,在建立一个地方封国时,在适当位置、有一定规模的“领土”是王室首先要考虑的问题^{[31]237}。而周王室之所以选择在随州册封多个诸侯国,显然是希望控扼南北交通的军事要塞,维护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稳定。从以上封国君主的爵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央王朝对南土边域的军事控制。与南阳盆地的诸位伯、君相比,随枣走廊一带的封君均称“某侯”,他们的身份是王朝封于边域上的军事驻防长官^[24]。昭王在南征期间多次通过赏赐的方式勉励他们,以获取政治和军事支持。

曾、鄂等国位于南土与南国的交界地带,周人对此地区的控制强弱视王朝的实力而定^[36]。与此同时,抵御南国反叛势力又需要地方诸侯的协助。西周时期,许多军事活动都是王室军队与不同地方封国提供的军事力量共同作战的结果^{[31]37}。近年来随州等地的田野考古发现也佐证了上述观点,叶家山曾出土三座西周早期曾侯大墓,其中M111墓主曾侯抗的活动年代集中在昭王时期。M111墓的面积和规格明显高于其他两座曾侯墓,且墓内随葬有大量作战所需的漆盾、车马器和青铜兵器^[37]。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上看,这位曾侯极有可能参与了昭王后期征讨叛乱的战争并且战功显赫。此外,根据曾侯编钟铭文的记载,随州之曾是西周早期姬姓南宫氏的封国,而中方鼎铭文里征伐虎方的“南宫”和中解铭文中执行赐礼的“南宫”正是曾国南宫氏的宗子^[38]。上引中解铭文提到厉侯曾经参与昭王省族、振旅的活动,并进献昭王赏赐臣子所需的马匹。由此可见,随枣走廊一带的地方诸侯都曾经“匍匐祇敬”地辅佐昭王南征。这说明西周早中期随枣走廊一带的地方诸侯虽然具备强大的军事作战能力,但仍然听从周王的指挥并履行对王朝的军事义务,中央王朝对南土边域诸侯拥有较强的控制权。

(三) 赐邑

昭王南巡时曾经多次赐予有功之臣采邑和

封地,且所赐之邑多集中在南巡路线的周围。静方鼎铭文云:

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命师中罢静省南国相,执应。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命静曰:“卑汝,嗣在曾噩(鄂)师。”王曰:“静,赐汝鬯、旂、市、采罍。”(《铭图》02461)

静省察南国后返回成周述职,昭王赐给他“罍”地的采邑并命令他在曾、鄂二地驻师。“罍”地应距曾、鄂不远,具体地望已不可考,或即随枣走廊附近某个未完全纳入周人控制的地方。

安州六器中的另一件中方鼎也记载了昭王赐予中采邑一事,其铭文曰:

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鞞(次),王命大史兄(祝)福土。王曰:“中,兹福人入史(事),赐于武王作臣,今兄(祝)畀汝福土,作乃采。”中对王休命,鬯父乙尊。(《集成》2785)

昭王南巡前曾经同时发布命中和静省南国的诏令,但静方鼎中只有静返京述职的记录,未见中的踪影。而中方鼎所记之事恰恰发生在昭王南巡过程中,所以中奉王命省察南国后可能并未回京。昭王感念中贯行开拓之功,于是赐予他孝感附近的“福土”作为采邑,中因此留在南土继续发展,其所作的安州六器也就埋在孝感,直至北宋年间才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昭王南巡时赐予臣子的封地是具有军事性质的边地采邑,不同于畿内诸侯的封建采邑,而类似于两周之际平王赐予秦国的岐西之地,《史记·秦本纪》载: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39]

《国语·郑语》记载平王之末诸国代兴时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韦昭注:“取周土,谓庄公有功于周,周赐之土……故得西周丰、镐之地。”^{[17]352-353}岐、丰之地名义上属于周王朝,实际上却在犬戎的控制之下。周王室东迁之后无力征讨,所以平王将岐、丰之地赐予秦,意在给予其开拓西土的自主权,以广地益国、征伐犬戎。

随州枣树林出土的曾公卣编钟铭文有类似记载：“皇且(祖)建于南土……南方无疆，涉征淮夷，至于繁阳。”所谓“涉征淮夷，至于繁阳”名义上分封给曾国，实际上则需要曾国靠武力去争取^[26]。昭王赐予静等人的采邑大多位于南土与南国交界之地，这些缓冲地区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它们名义上处于周王朝领土范围之内，但实际上周人对此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昭王在南土边域的赐邑行为可以理解为是“恩惠换忠诚”^{[3]151}，不过这种“恩惠”不需要消耗周人实际控制的土地，因此周王室并没有实质性的损失。所以对于这些游离于周王朝实际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昭王确认无力统治之后便选择将其赐予诸侯和臣子，并鞭策他们“左右有周”“用征南方”^[26]，承担起为周王朝开疆拓土、扩大政治版图的责任。

从上述分析可知，昭王南巡时对随枣走廊一带采取的经营措施主要集中在军事控制方面，这是由区域政治地理性质所决定的。西周早期，周人在汉东地区的势力虽然已经延伸到随枣走廊东段^[40]，但随州、孝感等地一直若即若离于周王朝直接控制范围之外，属于南土与南国的交界地带。所以昭王在经略南土时极力采取军事措施加强对随枣走廊的基本控制，以保障南巡的顺利进行。除此之外，昭王还将随枣走廊附近游离于周王室控制的土地赏赐给诸侯和臣子，并给予他们征伐和经营的自主权，鞭策他们为周王朝辟土服远、广地益国。

三、南征失利后周王室南土治理模式的转变

虽然昭王在南巡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南土进行经营与开发，但南征行动仍然以失败告终，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南土地区原有的政治地理格局^⑦。与此同时，穆王时期淮水流域的南淮夷开始不断联合当地的族群发动叛乱，迫使周人在汉淮地区建立的军事防线不断向北收缩。面对南土政局演变的新动向，西周王朝继续根据“土宜”的原则调整南土经营的方针，并采取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对南土政治地理格局进行调整与重塑。

(一)徙封：地缘的联系

南土政治局势发生激烈动荡之后，地区政治、军事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考虑到在南土地区新建封国根基不稳，西周王朝开始采取徙封的方式将封国迁入新格局下的关键地区，重塑南土政治地理格局^⑧。与此同时，南方淮夷的不断叛乱使周人的政治势力无法继续往东南方向延伸，只能以畿南为根据地，向附近辐射影响力，通过控制地方封国的方式间接管理南土。在此影响下，西周王朝在南土地区的治理开始由之前的分散扩展式向集中回缩式演进，这对于西周中晚期南土政治中心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周昭王、穆王时期曾经徙封大量诸侯于汉淮流域，这些诸侯国主要以姬、姜为主，后来逐渐形成了文献中所谓的“汉阳诸姬、诸姜”。现在看来，“汉阳诸姬、诸姜”只是对汉淮流域封国的一种统称。这些国家是周王朝在南土设置的重要封国，有屏藩成周、镇守疆土之功用。厉王时，随州地区的鄂侯驭方勾结淮夷势力发动叛乱，严重威胁到西周王朝在南方地区的统治。于是厉王出动西六师和殷八师全力围剿叛军，并下令“剿(扑)伐噩(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集成》2833)。2012年河南南阳夏馆铺发现西周晚期鄂侯墓，证明厉王在扑灭叛乱之后并未将鄂灭国，而是将鄂国遗民迁往南阳附近^[41]。厉王对鄂国的徙封与改姓从侧面反映出西周晚期周王室对随枣走廊一带的控制力度已经大不如前，周人在南土的政治中心由汉淮流域逐渐向王畿移动。

除了徙南土地区旧有封国外，周宣王还将西土的申国和吕国迁封于南阳附近，以统领南土地区的其他异姓诸侯国。《诗经·大雅·崧高》记载了申伯受封的盛况：“亶亶申伯，王缙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郑玄笺云：“王又欲使继其故诸侯之事，往作邑于谢，南方之国皆统理施其法度。时改大其邑，使为侯伯，故云然。”^{[42]1221}宣王对申伯的徙封是对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一种调整，关于谢与“南国”的政治关系，《正义》曰：“经言南国者，谓谢傍诸国，解其居谢邑而得南国法之，故云谢是周之南国。”^{[42]1221}谢位于南阳盆地的中心地带，以谢为邑可以据此控制整个南阳盆地，申国都邑的选址与营建都体现出周王朝

对南土治理的规划。《国语·郑语》中史伯曾经分析西周末年南土的政治局势,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17]341},从西周中后期南土封国格局的变动中可以明显看出,周王室经营南土的重点和范围已经逐渐收缩至汉水以北的南阳盆地一带,这既是南征失败后周人势力被迫北撤的结果,也是周人在“土宜”原则下对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主动调整。

经过西周中晚期数百年的经略,西周王朝通过徙封再次确立了对南土地区的政治控制,并将南阳盆地重点建设成周人在南土的政治中心。南土亲周的地方诸侯逐渐成为王室的代理人,他们在地缘上以“满天星斗”的方式统辖着南土各个区域。这些地区性中心国家对于周边国家的联系和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它所在地域范围及其中封国关系的稳定^[43]。所以从因地制宜的角度来说,徙封诸侯于南土政治真空区域不失为西周中后期稳定南方政局的有效方式。

(二) 联姻: 血缘的结合

经过不断的徙封之后,南土地区形成了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共同戍守的政治格局。而面对与南土异姓诸侯的血缘亲疏问题,政治联姻逐渐成为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团结、拉拢南土异姓诸侯的有效方式。

《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44]《国语·周语中》:“夫婚姻,祸福之阶也。利内则福由之,利外则取祸。”^{[17]33}缔结政治婚姻的首要目的是对本国有利,即“亲亲以申固其家”^{[17]33}。梳理相关材料可知,西周中期以后周王室与南土诸侯的联姻频率明显高于西周早期,这一现象与西周王朝经略南土的政策密切相关^①。《国语·周语上》载:“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17]22}昭王曾娶房国之女为后,这场政治联姻为昭王时期的南巡行动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西周中晚期的鄂侯簋铭文云:“噩(鄂)侯作王媯媯簋,王媯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集成》3928)鄂国宗室女曾经嫁与周夷王为妻。除此之外,周厉王时还曾与南土番国联姻,通过结“两姓之好”的方式拉拢南土异姓诸侯。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西周中后期周王室除了采取徙封诸侯统治汉淮地区之外,还通过

政治联姻的方式与南土诸侯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与往来。周天子选择与南土异姓诸侯国联姻是基于政治“内利”的目的,与周王结为亲家的南土诸侯均是地缘战略位置重要或者政治实力强大的国家,他们与周王室的姻亲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土政治地理格局的发展走向。血缘的结合使得周王室与南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而婚姻所缔结的裙带关系也确实帮助周王朝达到了“协比南土”的政治效果。

总而言之,昭王南征的失败使得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两大地理区域难以进一步整合,同时南方族群的持续反叛也打乱了南方地区旧有的政治秩序,南土政治地理格局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与重塑。基于南土政治发展的新动向,周王室开始遵循“土宜”原则改变原有的政策方针,采取徙封和联姻相结合的“地缘-血缘”模式来实现对南土地区的有效统治。西周中后期,周王室经营南土的范围和措施较西周初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西周王朝遵循的“土宜”之法是推动南土治理模式转变的主导因素。

结 语

南土名义上属于西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地理范围,但实际上周人在不同时期对南土不同区域的掌控力度和经营措施都不尽相同,这源于周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土宜”之法的遵循和应用。其中,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是南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昭王南巡过程中重点经营和开发的两大区域。根据两大区域不同的政治地理性质,昭王分别采取了差异化的经营措施。昭王南征失败之后,南土地区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为了稳定南土政局,周王室继续遵循“土宜”原则对原有治理方针进行调整,并依靠徙封诸侯和异姓联姻相结合的“地缘-血缘”模式逐渐完成了对南土政局的重塑,推动南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向稳固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目前学界对昭王南征铜器的划分争议较大,各家歧说迭出。本文主要参考的铭文材料为安州六器以及静方鼎等器物,因文章不涉及断代问题,所以仍依唐兰先

生之说,将其年代定于昭王时期。参见李学勤:《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收入朱凤瀚、张荣明主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355页;赵庆森:《“昭王南征而不复”之蠡测——基于文本形成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王祁:《西周早期南征青铜器群及相关史实考察》,《出土文献》2016年第2期。②参见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23页;刘礼堂:《关于周昭王南征江汉地区有关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黄锡全:《“安州六器”及其有关问题》,《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01页;李裕构:《新出铜器铭文所见昭王南征》,收入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285页;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赵庆森:《“昭王南征而不复”之蠡测——基于文本形成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赵燕姣、吴伟华:《金文所见昭王南征路线考》,《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18年第2期;雷晋豪:《西周昭王南征的重建与分析》,《文史》2022年第3期。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文中均简称为《集成》。④参见祝昊天:《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所见秦南阳郡交通线路新探》,《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1期。⑤长期以来,学者均把随枣走廊一带划归为南国西部区域,但近年来随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界定随枣走廊一带的地理性质提供了新的线索。2019年随州枣树林出土的曾公昧编钟追述了先祖始封的相关事迹,铭文曰:“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可见始封之初曾国便位于西周王朝的南土。尹弘兵从地理学和考古学的角度对昭王南征进行考察,认为西周早期汉东地区的周势力已经分布到随枣走廊东段,今随州一带,只不过随州地区的周势力是密集分布,随州以南地区则是点状分布。参见尹弘兵:《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由此可知西周中期随枣走廊一带不宜划归为南国西部区域,可以视为南土与南国交界的缓冲地带。⑥参见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文中均简称《铭图》。⑦近年来极具代表性的随州曾国墓地和鄂国墓地的考古发现都在西周中期出现缺环,说明昭王南巡失败之后西周王朝再也无力控制南土边域,周人势力被迫急速北撤,以致西周早期便立国于此的曾、鄂二国不得不迁徙都邑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随州叶家山墓地最后一代曾侯为昭王时期曾侯紈,其墓地东侧存在大片空白地带,整理者推测是为曾侯紈夫人预留的墓地。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

叶家山M11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2期。但昭王南征失败之后南土地区的政治局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曾国的政治中心被迫迁移,叶家山曾国家族墓地也遭到废弃。而曾侯紈的夫人应晚于曾侯紈往生,根据“陵随都移”的规律,曾侯紈的夫人极有可能葬在了曾国新都周围。⑧参见于薇:《西周封国徙封的文献举证——以宜侯矢簋铭文等四篇文献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13年第1期。⑨参见刘丽:《从政治联姻看西周王朝统治——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见诸国为中心》,《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4分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版。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 萧统.昭明文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6.
- [3]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徐峰,译.汤惠生,校.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4]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3[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77.
- [5] 史念海.河山集:七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6-117.
- [6] 黄锡全.士山盘铭文别议[J].中国历史文物,2003(2):60-65.
- [7]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 [8]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M]//中华书局编辑部.古文字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12-123.
- [9]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0]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 [11] 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M]//李学勤.出土文献:第4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177-279.
- [12] 黄锡全.“安州六器”及其有关问题[M]//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98-99.
- [13] 黄锡全.启卣启尊铭文考释[M]//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78-79.
- [14]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15] 黄益飞.金文所见“应”与西周政治统治[J].考古,2016(9):91-104.

- [16] 赵燕姣, 吴伟华. 金文所见昭王南征路线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2): 50-58.
- [17] 左丘明. 国语[M]. 韦昭,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18] 江鸿. 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J]. 文物, 1976(2): 42-46.
- [19] 石泉.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333.
- [20] 郑伊凡. 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阳”县考辨[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8(1): 112-117.
- [21] 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21-324.
- [22] 裘锡圭. 史墙盘铭解释[J]. 文物, 1978(3): 25-32.
- [23] 张光裕. 西周士百父盃铭所见史事试释[M]//陈昭容. 古文字与古代史: 第一辑. 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7: 214.
- [24] 朱凤瀚. 论西周时期的“南国”[J]. 历史研究, 2013(4): 4-15.
- [25] 王辉. 商周金文[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92.
- [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曾公暉编钟铭文初步释读[J]. 江汉考古, 2020(1): 3-30.
- [27] 十三经注疏: 周礼注疏[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28] 刘熙. 释名疏证补[M]. 毕沅, 疏证. 王先谦, 补.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97-199.
- [29]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陆[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6: 128.
- [30] 张昌平. 公元前5世纪一位国君的旅行用具: 曾侯乙帷帐的结构与设计[J]. 华夏考古, 2020(5): 46-51.
- [31] 李峰. 西周的政体: 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 [3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文峰塔 M1(曾侯與墓)、M2 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2014(4): 16.
- [3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曾都区考古队. 湖北随州庙台子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2022(1): 3-14.
- [34] 张昌平. 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J]. 文物, 2011(11): 87-94.
- [35] 徐少华. 古厉国历史地理及其相关问题[J]. 江汉论坛, 1987(3): 68-72.
- [36] 赵燕姣. 西周时期的“南国”、“南土”范围刍议[J]. 南方文物, 2013(4): 52-56.
- [3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叶家山 M111 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2020(2): 3-86.
- [38] 黄凤春, 胡刚. 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 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 江汉考古, 2014(5): 41-45.
- [3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79.
- [40] 尹弘兵. 地理学与考古学视野下的昭王南征[J]. 历史研究, 2015(1): 4-21.
- [41] 崔本信, 张海滨, 曾庆硕, 等.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 M5、M6 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 2020(3): 12-32.
- [42] 十三经注疏: 毛诗正义[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43] 于薇. 徙封: 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结构一过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302.
- [44] 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647.

The Differentiated Path and Political Pattern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Soil Management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Zhao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Focusing on New Bronze Inscription Material

Liu Wei and Mou Haoxin

Abstract: The Nanyang Basin and the Suizao Corridor are the two major geographical units between Hanshui and Huaishui, and are also the key areas for King Zhao to manage the southern soil. In view of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geographical values of the two places, King Zhao adopted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measures, focusing on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Nanyang Basin and military control over the Suizao Corridor. Faced with the turmoil in southern soil after the failure of King Zhao's southern expeditio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egan to adopt the “geo-blood” model of combining migration and marriage to achieve effective rule over the southern soil.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southern soil in the middle and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we can see that the method of “Tuyi” (土宜) has always been the basic principle followed by the Zhou people when chang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Key words: King Zhao; southern soil operation; governance model; “Tuyi”(土宜)

[责任编辑/知 然]